

中共與蘇聯邊界衝突的由來

尹慶耀

——從「邊界談判」看中蘇共關係之一

引言

中共和蘇聯之間，目前沒有黨和黨的關係，只有國和國的關係。談到國家關係，它們之間有貿易關係、有條約關係，互相派有大使駐在對方，但它們卻不斷宣稱希望在「和平共處」原則的基礎上，促使雙方關係正常化。然而，究竟有什麼地方不正常呢？要有，那應該是指雙方邊界的緊張情勢而言。截至本文執筆時為止，算來已進入第九個年頭的北平副部長級邊界談判，并未使中共和蘇俄的緊張情勢緩和下來，把這說成不正常，并無不可。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北平邊界談判蘇方的首席代表、外交部副部長伊里切夫（I. F. Ilichev），於返國十八個月之後重回到北平（其副手甘科夫斯基（Gankovskiy）將軍先一月抵平），受到相當「熱烈」的歡迎，停頓了一年半之久的邊界談判，即於十二月三日恢復。但是，同月九日晚間，中共駐蘇「大使館」就傳出消息說，談判並無進展。

雙方所爭爲何？或者說這個問題的關鍵何在？它的未來展望如何？在進入本問題的分析討論之前，有一些有關的問題，必須先弄清楚，方不致爲表面現象和雙方的宣傳煙霧所迷。

一 中蘇共黨分歧的由來

一談到中共和蘇聯的衝突，很多人士都注意到中蘇間長達四、五〇〇哩的國界，和自一八五八年至一八八一年帝俄併吞了一五〇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不過，日本「產經新聞」國際部次長柴田穗却明白指出，中共和蘇聯的對立，「既非起因於邊境紛爭，更非單純的肇因於雙方之對外關係」^①。紐約時報記者蘇資柏格（C. L. Sulzberger）在其所著「中（共）蘇冷戰的極峯」一書中

註① 柴田穗作「對『中』蘇交惡慎勿過分誇大」，原載一九七四年五月號日本「諸君」雜誌。

，也認為那兩個共產政權的衝突，有歷史、政治、軍事及意識形態各方面的淵源在。

這些說法是不錯的，在這些衆多的因素或淵源中，何者為主，何者為次？何者為先，何者為後呢？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二日，美國的哈洛特·辛頓教授（Prof. Harold C. Hinton）在美國衆議院亞太事務委員會的一篇講詞中，於分析中共與蘇聯衝突的根源時，曾特別注意到邊界爭執。不過，他也指出，今天雙方的邊界爭執，是導源於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兩「國」間思想的與政治的衝突。單就這一點而言，我們大致同意辛頓教授的看法，只是思想的與政治的衝突，其時間還須要略事提前。

根據中共自己的說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系列原則分歧」（也就是中蘇共的分歧），「這是從一九五六年的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開始的」。在中共看來，那次代表大會上提出的一系列問題，特別是關於史達林的問題和所謂「和平過渡」的問題，絕不是蘇共一黨的內部事務，而是同各國「兄弟黨」共同有關的重大問題，蘇共不應該事先不徵求「兄弟黨」的意見，武斷地作出結論，強迫「兄弟黨」接受。

關於反史問題，中共說從一九五六年四月到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曾多次同蘇共領導人談話中提出了批判意見。另於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發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十二月二十九日又發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篇專論，其中對史達林一生作了全面分析，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義，總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委婉地然而又十分明確地」批評了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錯誤論點。

關於「和平過渡」問題，中共除了在兩黨領導人談話中提出不同意見外，並於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在莫斯科第一次世界共黨會議期間，向蘇共提出一個書面的「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全面地、明確地闡明了中國共產黨的觀點」。這一次會議由毛澤東親率中共代表團參加，會中中蘇共代表團的爭論，主要是「關於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蘇共主張和平過渡，「在議會中爭取多數，并把議會從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變成真正的人民政權的工具」。中共說它的代表團「一方面同蘇共領導進行充分的協商，對他們作了必要的、適當的鬥爭，幫助他們改正自己的錯誤；另一方面又同其他兄弟黨領導人反復交換意見，力求達成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文件」。「鬥爭」的結果，是在那次會議的「宣言」草案上作了修改，在指出和平過渡的可能性的同時，也指出非和平過渡的道路；在談到取得「議會中的穩定的多數」的同時，強調「開展議會外的廣泛的羣衆鬥爭，摧毀反動勢力的反抗，為和平實現社會主義革命準備必要的條件」^②。然而，這結果必然會招致蘇共的不滿。

我們似乎可以作這樣的假定：一九四三年六月，史達林為爭取盟國援助抗德而解散了第三國際，此後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就靠史達林的個人權威來領導，但缺少一個有形組織的權力中心。史達林生前已有狄托的反抗，死後東歐立即呈現不安。再成立國際中心固不可能，而蘇共也沒有第二個史達林出現。黑魯曉夫肝情度勢，於一九五五年五月訪南與狄托修好，一九五六年二月發動反

註② 本節所引，請參閱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兩編輯部文章「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簡稱一評。

史，四月解散「共黨情報局」^③。反史確曾引起東歐動亂，但到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已趨安定，黑魯曉夫就想用世界共黨的國際會議這個無形的中心，代替過去的有形中心；把蘇共綱領裝進國際會議的綱領性文件中，作為世界共黨的共同綱領，照樣可以恢復蘇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元領導權。假使這個說法不錯，那麼從蘇共立場看來，中共在上述會議中的鬥爭，是既不「必要」也不「適當」的。中共聯絡其他「兄弟黨」來「鬥爭」蘇共，豈不是向蘇共的領導權挑戰？那不等於從根本上摧毀黑魯曉夫召開世界共黨國際會議的動機與目的？

二 由意識形態之爭到「國家」利害之爭

最初，中蘇共黨的意識形態之爭，并不曾影響兩個政權之間的國家關係。我們可略舉幾事為例。

一九五六年二月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通過的蘇聯第六個五年計劃，要集中力量開發烏拉爾山以東的西伯利亞地區，而中共則以東北的工業基礎，積極擴大生產，以其餘力支援西北和西南的工業發展，並將其東南的工業轉移至西北，建設西北的新工業地帶。中共和蘇聯優先發展的都是與軍事有關的重工業、動力工業。在交通運輸方面，除東北的鐵路已可直達莫斯科外，由北平經集寧——烏蘭巴特到莫斯科的直達列車，也已於一九五六年一月三日通車。同年四月米高揚訪平，中共又接受了二五億舊盧布貸款，以加速修築蘭州——迪化——阿克斗卡（蘇境）鐵路，以便與蘇聯的土西鐵路接軌。這條鐵路原定一九五八年竣工，嗣因雙方關係惡化而停工。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八日，中共與蘇聯簽訂合作勘察與綜合開發阿穆爾河（中國境內稱黑龍江）流域協定。這些都與經濟合作與配合發展有關，看不到在邊界上彼此戒備的踪影。直到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雙方還簽訂了「國防新技術協定」，由蘇聯幫助中共發展核武器。同年十一月毛澤東赴莫斯科參加蘇聯十月革命四十週年紀念并出席第一次世界共黨國際會議，除率領一批理論家外，還有以彭德懷為首的軍事代表團和以郭沫若為首的科學技術代表團隨同前往，其目標仍然是爭取援助與促進合作。不過，在世共會議中，雙方却發生了衝突。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黑魯曉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提出各種重要產品在十五年內趕上和超過美國的口號。十二月二日中共的「中華全國總工會」第八次大會中，也提出「在今後十五年內，要在鋼鐵和其他重要工業品產量方面趕上或超過英國」的口號。一九五八年元旦，「人民日報」社論「乘風破浪」中表示，要在十五年左右時間超過英國，準備再用二十年到三十年時間，在經濟上趕上或超過美國。這表明，中共雖然不贊成蘇共的經濟競賽口號，却曾一度想追隨蘇聯之後，和英美展開經濟競賽。

註③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史達林根據狄托（一九四五年）建議，於一九四七年十月五日，成立「歐洲九國共黨情報局」，參加者為蘇、南、保、羅、匈、波、法、義、捷共黨，并非全世界共黨的領導中心。不久，史、狄反目，一九四八年六月情報局第三次大會，決議開除南共，總部由貝爾格萊德（Belgrade）遷往布加勒斯特（Bucharest），名稱亦改為「共產黨與工人黨情報局」，但少有具體活動。

一九五八年是中共第二個五年計劃的開始，也可說是經濟競賽的起步。於是它擬具了一個工業和農業、重工業和輕工業、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同時並舉的龐大計劃。五月間，陳雲、李富春、葉李壯向黑魯曉夫要求援助，黑某當時並未答應，迫使毛澤東「兩條腿」躍進而終歸失敗。黑魯曉夫反而影射攻擊中共的社會主義建設是「超階段」和「平均共產主義」，抨擊人民公社「實際上是反動的」。

同年八月黑魯曉夫訪問中國大陸，雙方簽訂協定，蘇聯對中共在技術上援建和擴建四十七項工業企業和電站，但黑魯曉夫曾提出與中共組聯合艦隊、蘇聯軍艦可駐紮大陸港口的建議，被中共認為是蘇聯企圖從軍事上控制它而予以拒絕。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蘇聯片面撕毀它和中共所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另「中」蘇原子合作協定」不同時廢止），拒絕向中共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這已經影響到雙方的國家關係了，不過，中共指稱是一九六〇年夏季，「蘇共領導把中蘇兩黨之間的意識形態的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方面來了」。同年六月，羅馬尼亞工人黨（現稱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時，中蘇共黨發生了公開衝突。同月十六日，蘇聯通知中共，將在一個月內全部撤走在大陸工作的一千三百餘名蘇聯專家，撕毀幾百個協議和合同，使中共經濟慘遭打擊。中共說，蘇聯還片面撕毀雙方分別出版和互惠發行「友好」雜誌和「蘇中友好」雜誌的協議，無理要求中共召回駐蘇使館的一個工作人員，「并且挑起了中蘇邊界糾紛」。

中共認為蘇聯在對它「施加一系列的政治的、經濟的和軍事的壓力」^④，於是雙方衝突就不限於意識形態之爭了。但由前述中共和蘇聯分歧的由來和發展的梗概看來，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雙方是由黨與黨之爭發展到國與國之爭，由意識形態的衝突導致了包括邊界問題在內的國家利害的衝突。

三 邊界和領土問題的提起

如前所述，一九六〇年時，蘇聯已挑起邊界糾紛，當時似係漁業權之爭。一九六二年四月至五月間，蘇聯駐新疆的機構和人員，在伊犁地區進行顛覆活動，引誘和脅迫六萬多中國人跑到蘇聯境內，中共再三抗議交涉，蘇聯政府還以「蘇維埃法制感」、「人道主義」為藉口，拒絕遣返。這些都是中共於事後提出的^⑤。

一九六二年十月加勒比海危機時，中共曾指桑罵槐抨擊蘇聯讓步、遷就甚至投降。同年十二月十二日，黑魯曉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作報告時，對中共反唇相譏。他指出在中國沿海離珠江口不遠的地方有個澳門，小到在地圖上很難找到，早在十六世紀中

註④ 本節所引，請參閱「一評」。

註⑤ 見一九六四年五月九日「人民日報」刊載中共中央和蘇共中央往來的七封信中「中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給蘇共中央的信」。六萬多人的數字，根據其
他資料補入。

葉，葡萄牙人就租借了這塊地方，一八八七年又使它完全脫離中國，成為葡國的殖民地。那裏還有英國的殖民地香港，位於西江三角洲。他以極具諷刺的口吻說：「從這些地方發出來的氣味一點也不比殖民主義在果阿^⑥發出的味道好聞」。「但是，難道有人會因為殖民主義的殘餘沒有被觸動而譴責中華人民共和國嗎？……：如果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容忍澳門和香港，那麼，看來這是有着分量的原因的。因此，指責它，說什麼這是對英國和對葡萄牙殖民主義者的讓步，說什麼這是遷就主義，這是荒唐的」^⑦。

這一段話踩到中共的痛腳，它於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人民日報」社論「評美國共產黨聲明」中，歷數百年來列強與中國簽訂的許多不平等條約，包括瓊瑋條約、北京條約和伊犁條約等等在內。而後說：「你們不是不知道，香港、澳門這類問題，屬於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帝國主義強加於中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問題。試問，你們提出這一類問題，是不是要把所有不平等條約問題通通翻出來，進行一次總清算呢？」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毛澤東接見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細迫兼光及荒哲夫（社會黨北海道本部訪問團團長）等，在談話中提出了領土問題。這次談話會由同年八月十一日出版的日文「世界週報」第四五卷三二號譯載，又收入中共某部輯印的「毛澤東思想萬歲」一書中。後者的原文如左：

「蘇聯佔的地方太多了。在雅爾達會議上就讓外蒙古名義上獨立，名義上從中國劃出去，實際上就是受蘇聯控制。外蒙古的領土，比你們千島的面積要大得多。我們曾經提過把外蒙古歸還中國不是不可以。他們說不可以。就是同黑魯曉夫、布爾加寧提的，一九五四年他們在中國訪問的時候。他們又從羅馬尼亞劃了一塊地方，叫做比薩拉比亞。又在德國劃了一塊地方，就是東部德國的一部分。把那裏所有的德國人都趕到西部去了。他們也在波蘭劃了一塊歸白俄羅斯。又從德國劃了一塊歸波蘭，以補償從波蘭劃給白俄羅斯的地方。他們還在芬蘭劃了一塊。凡是能夠劃過去的，他都要劃。有人說，他們還要把中國的新疆、黑龍江劃過去。他們在邊界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見就是都不要劃。蘇聯領土已經够大了，有二千多萬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兩億。你們日本人口有一億，可是面積只有三十七萬平方公里。一百多年前，把貝加爾湖以東，包括伯力、海參崴、勘察加半島都劃過去了。那個賬是算不清的。我們還沒跟他們算這個賬。所以你們那個千島羣島，對我們來說，是不成問題的，應當歸還你們的」^⑧。

至此，所謂邊界問題、領土問題就正式登場了。但它是由意識形態或理論與策略鬥爭所引起的，是果不是因。

四 邊界衝突的擴大

提到中共和蘇聯的邊界衝突與邊界談判，人們都會把目光注射到一九六九年，其實這些都是早已開始了的。依照中共的說法：

註⑥ 果阿（Goa）在印度西南海岸，原為葡領，面積約四萬平方公里，人口約六十四萬，一九六一印度以武力奪回。

註⑦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日「人民日報」譯文。

註⑧ 引自「毛澤東思想萬歲」，五四〇—五四一頁。

「早在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二日和九月二十一日，中國政府就先後兩次主動向蘇聯政府建議舉行談判。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國政府還向蘇聯政府提出了關於維持邊界現狀、避免衝突的六項建議。一九六四年，中蘇邊界談判終於在北京舉行。談判中，中國方面提出了以有關目前中蘇的條約為基礎解決邊界問題的合情合理的主張，為解決中蘇邊界問題做了最大的努力，表現了最大的誠意」。「一九六四年以來，蘇聯政府大量增兵中蘇邊界，破壞邊界現狀，進行武裝挑釁，製造流血事件。從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五日到今（指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五日以前，蘇聯方面挑起的邊境事件竟達四千一百八十九起之多，比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四年期間蘇聯方面挑起的邊境事件增加了一倍半，手段更為惡劣，氣焰更為囂張，蘇聯軍隊侵入中國領土，殺人放火，打死、軋死手無寸鐵的中國漁民、農民，甚至活活把他們扔到江裏」^⑨。

關於邊界衝突，自然是雙方各執一詞。例如蘇聯曾宣稱：在一九六二年與一九六三年兩年間，中共軍隊侵犯俄境，每年各達五千餘次之多。中共的「外交部長」陳毅則稱，自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六年，蘇聯製造的邊境事件達五千次。跟着，蘇聯的「真理報」又反唇相譏說，一九六六年這一年，中共在邊境挑釁即達五千次。這些話實難令人盡信，但雙方邊界確有武裝衝突，當係不爭的事實。而邊界衝突於一九六九年達到高潮。

一九六九年的邊界衝突，首先於三月二日發生於烏蘇里江上的珍寶島（俄稱達曼斯基）。此後雙方的衝突，就「從烏蘇里江擴大到黑龍江，從水界擴大到陸界，從東段擴大到西段」。三月十五日在珍寶島南端的衝突，中共動用了一個團的兵力，還附有增援部隊，蘇軍的李昂諾夫上校（Col. Leonov）陣亡，中共軍也傷亡頗重。據中共報導，「八月十三日上午蘇聯方面出動直升機兩架、坦克、裝甲車數十輛和武裝部隊數百名，侵入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裕民縣鐵列克提地區縱深達兩公里……首先開鎗射擊，當場打死打傷我邊防戰士多名，為了避免事態擴大，我邊防巡邏人員在遭到蘇聯武裝部隊的襲擊後，隨即後撤至我境縱深」（同日「新華社」電）。

由珍寶島至裕民縣事件之間，中共和蘇聯還在黑龍江以及新疆的中蘇邊境，發生過多次大大小小的衝突。就在這武裝衝突擴大聲中，蘇聯一方面向各國共黨發出通函，指中共正計劃進行邊境長期戰爭，表示蘇聯必須準備行動，阻止中共將邊境變成「流血的傷口」；一方面有計劃散播蘇聯準備摧毀中共核子基地，即將發動「預防戰爭」的消息。這一措施迫使中共終於走向會議桌邊，同時也招來美國想趁機「插手」。

五 邊界談判的開始

一九六三年七月，莫斯科有兩項重要會議。其一是中蘇共黨改善關係的會議，鄧小平於五日率團前往莫斯科，談到二十日無結

註⑨ 一九六九年五月廿四日中共政權「聲明」。「新華社」於同日報導。

果而散。其二是從十五日到廿五的美、英、蘇停止核試會談，結果簽訂了局部禁試條約。中共於七月三十一日發表「主張全面、徹底、乾淨、堅決地禁止和銷毀核武器、倡議召開世界各國政府首腦會議的聲明」。八月間，「人民日報」連續發表「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爭取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二日社論）、「這是對蘇聯人民的背叛」（三日社論）！「爲什麼三國條約有百弊而無一利」（十日）、「中國政府發言人聲明——評蘇聯政府八月三日的聲明」（十五日）。這些文章或聲明，都是反對三國禁試條約的。因爲一則中共自己要發展核武器，它反對三國作「核壟斷」；再則中共認爲黑魯曉夫當時有意與西方妥協，集中精力來對付中共。於是，中共於同年九月六日發表「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作爲「九評」中的第一評，把意識形態的鬥爭升高。另一方面，它也於八月二十三日向蘇聯提出關於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的建議。想來，那時候的邊界衝突已經相當嚴重。

一九六四年二月，中共和蘇聯曾在北平舉行過劃定邊界的初步談判。同月二十九日，中共給蘇共中央的信中，對邊界問題表示它的立場，可歸納爲如下幾點：（一）中共一貫認爲，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中蘇兩國邊界問題，可以通過談判解決，在沒有解決以前，應當維持邊界的現狀。（二）指摘蘇聯不斷破壞邊界現狀，進佔中國領土，挑起邊界事件。更嚴重的是，蘇聯明目張胆地在中國邊境地區進行大規模的顛覆活動，公然通過報刊和廣播挑撥中國各民族的團結，煽動中國的少數民族從祖國分裂出去，並且誘騙和脅迫幾萬中國公民跑往蘇聯。（三）聲言現在中國的鄰國，只有蘇共領導和印度的反動的民族主義者，故意製造同中共的邊界糾紛。中共不僅同蘇聯以外的所有社會主義兄弟鄰國，而且同印度以外的民族主義國家，如緬甸、尼泊爾、巴基斯坦、阿富汗等鄰國，都圓滿地解決了歷史遺留下來的複雜的邊界問題。（四）其時中蘇兩個共產政權的代表團已於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北平開始邊界談判，中共表示儘管歷史上簽訂的有關中俄邊界的條約是不平等條約，中共仍然願意尊重這些條約，並且以此爲基礎合理解決中蘇邊界問題。中共將根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準則」，本着平等協商、互諒互讓的精神，同蘇聯政府進行友好談判。這次談判，雙方提出的地圖不同，各執己見，無有結果。同年十月十五日黑魯曉夫垮台。十六日晨「塔斯社」發表了上項消息，當天下午中共就試爆了它的第一顆原子裝置，同時它也一度想趁此機會同蘇聯改善關係。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周恩來率團赴莫斯科參加蘇聯革命慶典，同月七日「人民日報」社論，以「在偉大的十月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爲題，強調「我們相信，中蘇兩國兩黨之間暫時出現的困難，終究只是歷史的插曲，是能夠逐步解決的。中蘇團結一定能夠恢復和不斷加強」。這顯示，儘管中共當時已斥蘇共爲修正主義^⑩，但在蘇共領導階層異動後，它仍然希望和蘇共言歸於好。只是蘇共當時態度堅強，拒絕了中共這項修好的表示。據中共事後的說法，當時布里茲涅夫面告周恩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問題

註⑩ 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日「人民日報」刊載「無產階級革命和黑魯曉夫修正主義——八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是中共公開斥責蘇共爲修正主義之始。

上，在對待中國的問題上，他們（布等）同黑魯曉夫沒有一絲一毫的差別^①。經過此一波折，中共對與蘇聯重修舊好似乎已斷念。於是，當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日，中共三屆「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關於政府工作報告的決議」時，就把過去對外政策總路線「發展同蘇聯和各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友好互助合作關係」一語中的「蘇聯」字樣刪去。同年十一月十一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兩個編輯發表聯合文章「駁蘇共新領導的所謂『聯合行動』」，聲言它同蘇共「在當代一切根本問題上針鋒相對，有互相分開的東西，沒有聯合起來的東西，有對立的東西，沒有共同的東西」。指稱「帝國主義和反動派是不打不倒的，現代修正主義也是不鬥不垮的」。「現在，擺在各國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面前的任務是，在政治上和組織上同為美帝國主義效勞的修正主義份子劃清界限，消除黑魯曉夫修正主義，迎接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革命鬥爭的高潮」。

這時候中共的戰略是，一方面號召「建立國際反美統一戰線」；一方面鼓動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招牌的共黨或組織，在美國的興趣，一九六六年三月，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遠東暨太平洋區小組委員會，舉行對中共及亞洲政策聽證會，作證人士不少主張對中共「和解」，而對所謂「圍堵」「孤立」政策則頗有責難。換句話說，美國想在中共及亞洲政策聽證會中插手。但其時中共已進入文革期，不久就展開「造反外交」，對美國深閉固拒，使後者不得其門而入。「造反外交」也使中共和蘇聯的關係進一步惡化，蘇共指摘毛澤東背叛馬列主義，並希望中共內部的「健康力量」能夠抬頭。

是一九六八年八月蘇聯率五國軍隊進侵捷克事件震驚了中共，迫使後者改變戰略部署。更由於一九六九年外間流傳頗廣的蘇聯將對中共發動突襲之說，迫使中共和蘇聯開始邊界談判。依辛頓教授說，事情是這樣的：一九六九年春夏之間，蘇聯在中蘇邊界迅速增兵，製造小的衝突，並給北平最後的通牒，限於八月十三日至遲是九月十三日開始和蘇聯協商邊界問題，且以進攻大陸摧毀其核子設施為要挾^②。這種說法是否確實，一時不容易判斷。但同年九月十一日，蘇聯總理柯錫金於赴河內參加胡志明喪禮後，返國途中從塔什干轉往北平，與周恩來在機場會談，雙方決定於同年十月二十日起，在北平再度舉行邊界談判。

同年「十·一」中共紀念口號第二十二條稱：「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特別要反對以原子彈為武器的侵略戰爭，從現在起就要有所準備」。十月七日，中共政權為將與蘇聯開始談判所發表的聲明中有云：「如果一小撮戰爭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襲擊中國的戰略要地，那就是戰爭，那就是侵略，七億中國人民就要奮起抵抗，用革命戰爭消滅侵略戰爭」。由此看來，所謂來自蘇聯的核子突襲之說，似非完全空谷來風。至少就中共說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而不得不加以戒備。也許正是為此，它才答應和蘇聯談判，並拉着美國當作一條臨時的救命繩。

註① 參見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聯合文章「駁蘇共新領導的所謂『聯合行動』」。
註②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二日辛頓在美國眾議院亞太事務委員會講詞。